

14~17世纪中国封建社会转型与明代政治发展

李 渡

(同济大学 文法学院, 上海 200092)

摘 要: 文章对明代政治发展的特点作了分析,认为考察明代政治发展进程,必须将其置于14至17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变化的总体历史背景之上。这一时期,中国逐步由领先于世界走向落后,明代政治的影响不可小觑。

关键词: 14-17世纪;封建社会转型;明代政治

任何一种政治形态或政治制度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及思想文化领域内各种矛盾冲突斗争的集中反映。因此,我们考察研究明代政治发展进程,必须将其置于14至17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变化的总体历史背景之上。

明王朝自1368年肇建至1644年灭亡,统治中国垂三百年。李洵曾对14~17世纪的明代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基本历史特点作了一个精辟的概括:“公元十五、十六世纪的明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乃至亚洲历史上的重要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开始发生进一步结构性变化的时期。对这一时期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将是深入理解中国社会从古代到近代之关键历史转折点,以及形成中国近代社会结构诸因素的重大研究课题。公元十五世纪存在着一个以明代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世界。”^{[1](P1-2)} 史实表明,14世纪以降,中国封建社会经过长期发展,已步入关键性的历史转型期,明王朝与以往各个朝代相比,封建国家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均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特别在其政治发展进程中,鲜明地体现了晚期封建社会

的基本特点。

明代中国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15~16世纪,在明王朝一些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地区和某些手工业生产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经济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重大历史性变化最明显的表征。

1.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明前期的百余年中,特别是在洪武、永乐时期,由于统治者实行了诸如奖励垦荒、移民屯田、兴修水利、整顿赋役制度、减轻农民负担等一系列具有积极意义的方针政策,使元末明初残破的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15世纪初的明帝国,封建经济高度繁荣,人口众多,国力强大,所谓“仁宣之治”成就了又一个封建“盛世”。

明代的手工业生产,如纺织、矿冶、制瓷、造船、造纸、印刷、制茶、兵器制造等行业,在生产规模、制作的技术水平以及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品种

收稿日期:2005-10-02

作者简介:李渡(1954-),男,湖南沅陵人,同济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政治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上,与宋、元时期相比,也都有了显著的发展、进步。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无论其出航的目的或经济效果如何,这一事件本身的重要历史意义是不容低估的。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计下西洋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梢、买办、书手,通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名”^[2],先后七次远航两大洋,与数十个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以郑和为统帅的中国舰队,历“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余万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而我之云帆高扬,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3](P403)}浩浩荡荡航行于太平洋、印度洋之广大海域间。据近人考证,郑和船队中最大的“宝船”,“长达十八丈,阔四丈四尺,排水量为1200吨。比起哥伦布的旗舰排水量233吨和达·伽马航行印度的船排水量不超过300吨,确实大得多”^{[4](P114)}可以说,郑和的“宝船”是明代手工业发展水平的一个缩影和标志。

2. 在明前期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推动之下,至明中叶的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空前活跃,其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可以说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这一时期除了表现出历史上封建经济繁荣期间通常所伴生的商品生产扩大、市场及内外贸易发展兴盛等一般性特点外,还有两个方面的现象应给予特别的注意:第一,白银已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其数额也十分巨大。“据梁方仲先生统计,从洪武二十三年至成化二十二年(1390~1486年),白银的产量历年累积数至少在3000万两以上。自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年)的72年中,葡萄牙、西班牙、日本诸国由于贸易关系而输入中国的银元,至少在一亿元以上。”^{[5](P127)}这些白银大部分被投入了流通领域。“海内贸易皆用银钱”^[6]第二,在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工商业城镇,如苏州府属的盛泽镇、震泽镇,嘉兴府属的濮院镇、王江泾镇,湖州府属的双林镇、南浔镇等都是专门经营丝绸纺织业的市镇。类似的市镇在其它省区也有出现,如江西的景德镇就是驰名中外的瓷器制造业中心。这些城镇不是封建王朝的政治或军事据点,而是以手工业生产或商品交换为主要功能的新型城镇。大批专业化工商业

城镇的出现,标志着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扩大,是货币资本集中的先决条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的历史前提。

16世纪以后,在商品经济异常发达的江南地区和某些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证明,迄明朝中后期,在江南地区的纺织业中,已经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具有明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征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这里需要强调:尽管研究者对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间和发展程度有不同看法,但对明代嘉、隆、万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并有所发展这一事实基本上不持异议。正如侯外庐所言:“从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叶,也就是从明嘉靖到万历年间,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7](P91)}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有力地侵蚀着封建经济结构,动摇了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统治基础,是晚期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二

明王朝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充分体现了晚期封建社会的时代特点。

14~17世纪明代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封建社会各种固有矛盾空前激化。明代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及民族矛盾互相交织、错综复杂、贯穿始终、对抗激烈,斗争残酷血腥,具有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极其尖锐激化的时代特点,曾对有明一代三百年的政治发展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明王朝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其持续时间之长,手段之残酷,过程之激烈复杂,以及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干扰破坏,可谓空前绝后。根据其性质与形式的不同,我们将明代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1. 朱氏皇族内部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展开的斗争。举其要者,如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变”;宣德初“汉王高煦之叛”;英宗的“夺门之变”;武宗正德年间的“安化王寘鐫之叛”和“宁王宸濠之叛”等。汉王高煦谋叛失败后,明宣宗先

将其父子囚禁于幽室,后以酷刑处死,党羽部属株连得罪者数千人。“天津、青州、沧州、山西诸都督指挥约举城应者,事觉相继诛,凡六百四十余人,其故纵与藏匿坐死戍边者一千五百余人,编氓者七百二十人。帝制《东征记》以示群臣。高煦及诸子相继皆死。”^[8](卷118《诸王传》)这些骨肉相残的流血事件表明皇族内部争夺帝位的斗争是何等激烈。

2. 专制主义皇权对具有威胁或潜在威胁的政治势力所进行的打击和镇压,其主要对象为勋贵集团、官僚集团,以及恶性膨胀的宦官势力。皇权通过制造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案件来剪除异己。如洪武时期的“胡蓝之狱”;永乐初的“壬午之难”;天顺朝的“曹石之变”;嘉靖初的“大礼议之争”;万历中的“追治张居正之罪”。以及宪宗逐汪直;武宗诛刘瑾;神宗斥冯保;崇祯帝之除魏忠贤、定“逆案”等。明成祖率军攻入南京后,追治所谓“建文余党”,对政敌进行了穷凶极恶的大屠杀。“而文皇甫入清宫,即加罗织,始而募悬赏格,继且穷治党与,乃若受戮之最惨者,方孝孺之党,坐死者八百七十人;邹瑾之案,诛戮者四百四十人;练子宁之狱,弃市者一百五十人……”^[9]凡此种种,无不充满迫害、阴谋、暴力、凶残、恐怖和血腥的气味。

3. 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从正统初年起,清流派和正统派的官僚士大夫就与不断膨胀的宦官势力进行激烈的斗争,而内阁大学士作为官僚政治势力的代表,往往在斗争中首当其冲。如“三杨”反王振;商辂劾汪直;刘健、谢迁斗刘瑾;以及东林党人对魏忠贤的殊死抗争等,双方的斗争贯穿了明朝中后期的历史。宦官势力由于得到皇权的信任和支持,日渐嚣张。刘瑾、魏忠贤等得到皇帝特殊宠信的宦官甚至能够控制内阁,形成所谓的“阉党”,把持朝政,为所欲为。其中以天启朝“东林众正”反抗魏忠贤阉宦势的斗争最为悲壮惨烈。

4. 官僚集团内部不同派系、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这一类型的政争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为争夺内阁首辅、吏部尚书、都御史等要职而展开的权力之争,以嘉靖、隆庆两朝的“内阁首辅之争”最为典型。邓之诚称,“嘉靖以来首辅,莫不由倾轧排挤而得之”。^[10]可谓一语道尽。二是清

流派官僚士大夫同依附于宦官势力的“阉党”官僚之间的斗争,即所谓“正”、“邪”之争。《明史·阉党传》序谓:“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迨神宗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仇,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8](卷306《阉党传》)三是因政见、籍贯出身、门生座主等宗派利害关系而结党相攻。党争在万历时期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明神宗晚年深居简出,不见群臣,章疏论奏一概不省。于是廷臣各自拉帮结派以张势,危言激论以取名,部党角立,门户攻讦。时有所谓“齐党”、“楚党”、“浙党”等各色官僚派系小集团,他们“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8](卷236《夏嘉遇传》)激烈的无休止的党争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使政府行政陷于瘫痪状态,政治军事一切不可为,急剧加深了明王朝的统治危机,至此乱亡之局已定。

以上分析表明,从专制君主对功臣贵族的大肆屠戮到藩王发动的武装叛乱,从宦官势力对清流派官员的打击迫害到官僚集团内部的倾轧党争,明代的政争几乎包含了历史上同类斗争的所有形式和极端手段,并更为激烈和残酷。明代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充分暴露出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残暴与腐朽,也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在封建社会晚期,各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复杂的历史特点。

三

政治发展严重失衡成为明代政治历史进程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

所谓政治发展严重失衡,系指明代专制主义皇权充分发展和扩张,传统封建政治结构中相对独立于皇权和对皇权有某种制约作用的政治力量都被摧毁、铲除,或被置于皇权的绝对控制之下,政治体系亦不具有任何可以有效防止皇帝滥用权力的制约机制,皇权干预、支配、控制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垄断性的政治力量,形成了晚期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皇权政治结构。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这一问题。

1. 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基建国伊始,明历代统

治者无不殚精竭智,对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进行重大的调整和改造,最终形成和确立了“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11](卷90《中官考》)的极端君主专制政治体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洪武十三年,明太祖以谋反罪诛左丞相胡惟庸,并由此罢丞相不设,废止了已在中国历史上行用了1500多年的宰相制度。皇帝“总揽乾纲”,“事皆亲决”,皇权兼并了相权。“而会丞相惟庸败,析中书六之,尚书寄天下任,而大学士称近臣,不为置僚属,亡所治。天子方自操威福,亦亡所寄裁。”^[11](卷45《内阁辅臣年表》)与汉、唐、宋、元诸朝不同,明王朝领导和监督政府各部门工作的不是传统的“相权”,而是皇权。废除宰相制度,系秦汉以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发生的最重大的变革。

(2)为强化专制主义皇权统治,明统治者创立了内阁、司礼监等新型中枢权力机构。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辅助皇帝处理政务,两者互相制衡,互为补充,相辅为用,成为巩固和强化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有力工具。“国家政务,我太祖、太宗既设司礼监掌行,又命内阁大学士共理。内外相维,可否相济。近来政务之决,间有大学士不与闻者。今后政务不分大小,俱下司礼监及内阁,共同商榷,取自圣裁。”^[12](卷7)

(3)设立锦衣卫、东厂等特种镇压机构,依靠庞大的特务系统,采用非常手段,控制官吏军民,对反对皇权的异己力量进行残酷的打击和血腥的屠杀。“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8](卷95《刑法志》)厂卫特务伺缉捕,横行无忌,成为明代皇权维护和巩固其专制统治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2. 明统治者还通过建立和制订各种典章制度、条约事例、成文或不成文法,来限制、分割、平衡、牵制、削弱,甚至剥夺后妃、勋贵、宦官和文武大臣的权力。在权力运作机制上使政府各部门之间、不同的权力系统之间、内官和外廷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统治阶级中各种政治势力、政治派别和政治集团之间,犬牙交错,互相制约。明代皇权还针对各种政治势力、政治集团

的不同特点,采用不同的统治策略和控制措施,以确保皇权在政治上始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任何权力机构或个人都无法脱逸皇权的监控。明代最重要的两个中枢权力机构——内阁和司礼监——是由与皇帝关系极为密切的宦官和“侍从近臣”组成的,皇权无所不在地操纵着一切,无论是内阁的“票拟”,还是司礼监的“批红”,抑或是科道官的“纠劾”,以至厂卫特务的缉捕刑讯,都必须“取自圣裁”,即得到皇权的允准,才能发生政治效力。上述史实充分说明,国家政权运作的总枢纽是皇权,皇权之外,不存在任何相对独立的权力中心。在这种政治结构内,无法发育和形成皇权的异己势力,也不可能产生真正危及皇权的“权相”或者“权阉”。

四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写道:“在近代以前的各个文明中,显得最先进、感觉得出最优越的,莫过于中国文明。15世纪时,中国人口达到1~1.3亿,而欧洲只有5000~5500万。中国有卓越的文化;又有大片异常肥沃灌溉便利的平原,从11世纪开始,由一个优良的运河系统连接起来。中国有一个等级森严的统一政府,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儒家官僚集团掌权;这个政府使中国社会成为具有内聚力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国外来宾对此莫不称羨不已。”^[13](P5-7)诚如肯尼迪所言,14世纪中叶建立的明王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手工业经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强大的综合国力,并且与周边和海外诸国建立了相当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一句话,当时的中国具有无以伦比的发展潜力。然而这一前进趋势只持续了一百多年,自15世纪中叶以后,明帝国开始逐步走向衰落。迄17世纪初,就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而言,中国与欧洲一些先进国家相比,已处于落后状态。自16世纪中叶起,一批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其中影响较大者有利玛窦、艾儒略、邓玉函、熊三拔、汤若望等人。这些人与中国一些官僚士大夫交往,除传道布教外,也引进和介绍了部分自然科学成果。在数学、物理学、天文学、机械学、地理学等学术领域,特别在火器制造技术上,“西

学”已显示出其明显的先进性和优势地位。顺便言及,那些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并没有掌握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哥白尼、耐普尔、伽利略等伟大科学家的学说和著作,从未曾进行过系统的翻译、阐述和传播。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说16~17世纪中国已落后于西方,并不单纯指物质产品在数量或质量上的差距,而主要体现在新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和近代科学技术成果的发展运用上。因为这两点决定着未来谁能够首先跨入工业化社会。明朝中后期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并有所发展,但始终未能引发整个生产方式的革命。而同一时期的某些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法、荷、葡、西班牙等国,在海外贸易高额利润的驱动之下,表现出向外扩张殖民的强劲势头。市场的扩大,反过来又刺激国内商品生产迅速增长。适合大批量商品化生产的、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管理的手工工场不断涌现,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速度急剧加快,新生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日益增强。17世纪40年代爆发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在欧洲的一个大国里推翻了封建制度,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标志着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后欧洲各国相继走上了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也许是出于历史的巧合,公元1644年,腐朽的明王朝被农民大起义的风暴所推翻,但取而代之的却是政治上更加封闭保守的清王朝,中国继续在封建社会

的老路上蹒跚而行。自汉、唐以来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一直领先于世界的中华帝国,至明朝中后期始被西方诸国所超越。因此,明朝三百年的历史,是中国由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是中国由强盛走向衰弱的转折点!而明代政治发展对这一历史进程的作用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无疑将大大深化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历史转型与政治发展互动规律的认识和理解。

参考文献:

- [1] 李洵. 下学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 [2] 冯承钧. 星槎胜览校注·占城国条注文[Z].
- [3] 郑天挺. 明清史料(上册)[Z].
- [4] 李龙潜. 明清经济史[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 [5] 梁方仲. 明代粮长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 [6] 谢肇淛. 滇略(卷4)[Z].
- [7] 侯外庐.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 [8] 明史[Z].
- [9] 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Z].
- [10] 邓之诚. 中华二千年史·卷5(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1] 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Z].
- [12] 成化实录[Z].
- [13] 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M]. 天津编译中心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Feudal Societ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Ming Dynasty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I Du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Law,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paper maintains tha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ourse of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Ming Dynasty should be conducted against the gener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Chinese feudal society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China had been declining from a leading advanced country to a backward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refore,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the Ming Dynasty is not to be underestimated.

Key words: between 14th and 17th centuries, transformation of the feudal society, politics of the Ming Dynasty

(责任编辑:藏 峪)